

中国官场小说发展史

一条从晚清谴责、干部治理到网络类型化的权力叙事谱系

研究报告 | 资料核验日期：2026 年 8 月 11 日

摘要

“中国官场小说”并不是一个自古延续、边界固定的文类，而是后来的文学史、批评与出版市场围绕“公共权力如何运作”所形成的聚合性名称。它的历史，更适合被理解为一不断改名、分流和重组的权力场域叙事谱系：晚清的“新小说”与谴责小说借报刊连载集中揭弊；民国时期的官僚经验分流进市民小说、政治讽刺和抗战文学；1949年后，相关书写改用干部、机关、公仆伦理与社会主义治理的语言；1979年以后的改革文学重新塑造有行动力的体制内干部，并将叙事空间由工厂推进到部委和县域；1990年代中后期，案件化的反腐小说形成大众热潮；世纪之交，官场日常、组织规则、人格适应和精神异化成为新的中心；网络文学又将这一题材改造为超长连载、职位升级、职业成长与知识展示。本报告据可核书目、原刊信息、学术论文及专业文学评论，梳理上述演变，并把版本事实、文学史解释和价值评价分开陈述。其结论是：这条谱系的连续性在于对正式规则与实际运作落差的持久关注，断裂则发生在政治伦理、行动主体、叙事形式、生产机制和社会期待之中。

关键词： 官场小说；谴责小说；反腐小说；改革文学；网络文学；权力叙事

一、概念、范围与方法

1. “官场小说”是工作概念，不是古典固定文类

本文所称“官场小说”，是指以官僚机构及其延伸的公共权力场域为主要叙事空间，以官员、候补官员、干部、权力中介及受权力支配者为主要人物群，持续表现权力运行、职位升降、组织关系、显规则与潜规则、政治伦理和个体精神处境的小说。判断一部作品是否进入核心谱系，主要看三点：官僚机构或公共权力网络是否构成主要空间；权力配置、组织规则、任免升降或反腐机制是否推动主

要情节；作品是否把公共权力与人格、伦理的关系作为主要问题。只出现官员角色，而权力机制并非叙事中心的作品，不因题材沾边便自动纳入。

这一定义是本文为叙述历史而采用的分析工具，并不冒充学界唯一共识。晚清作者并未共同以今天的类型意义自称“官场小说家”；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官场小说”才明显成为出版、评论和大众文化中的宽泛标签。王跃文也曾明确认为这一称呼粗略且带贬义，更愿意从权力场域、人性异化与文化根源出发，将自己的相关创作理解为“政治文化小说”[1]。作者自我阐释不能取消外部批评分类，却提醒读者：类型名称本身也包含评价。

2. 与“谴责小说”“反腐小说”等概念的关系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中把1900年以后尤盛的一类作品“别谓之谴责小说”，所举特征既包括“揭发伏藏，显其弊恶”，也包括对时政的纠弹和对风俗的扩展；他还用“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概括其突出笔法[2]。因此，“谴责小说”结合了特定历史语境、批判对象和表现方式，并不等于只写官场。夏晓虹关于晚清“新小说”的研究也提示，“新小说”是包容性的运动和文类命名，政治、社会、科学、侦探等多种实践并存，不能用后来的单一标签压平[3]。

“反腐小说”则常按主题和行动线索命名。刘复生所讨论的是“以‘反腐败’为基本主题和中心线索”的一类主旋律小说，其常见结构包括发现腐败、调查受阻、牵出网络、上级或司法力量介入以及正义获胜[4]。“官场小说”更多按场域、人物和权力机制命名。两者大面积交叉，但不是严格的上下位关系：官场小说可以写升迁、适应、异化和日常组织生活而不以查案收束；反腐叙事也可能发生在司法、国企或商业等超出狭义官场的空间。

改革文学是当代官场、反腐书写的重要前史，却不能因写干部便全部归入官场小说；职场小说在网络阶段与官场叙事共享成长和竞争结构，但一般企业组织与公共权力仍有性质差异。“黑幕小说”也不应成为一切官场批判的同义词：鲁迅以此批评某些“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的后继写作[2]，所指恰是揭弊文学可能滑向私怨、猎奇与谩骂的限度。

3. 分期原则与资料限制

本报告把文学表达、文学生产和传播媒介的改变放在分期中心，而不把政治史年份机械等同于文类边界。主分期如下：约1900—1911年的晚清集中揭弊与报刊类型生成；1912—1949年的官僚社会书写分流；1949—1978年的干部、机关叙事重构、压缩与间歇；1979—1980年代改革文学对权力叙事的复兴与前类型化；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反腐热潮及官场生态转向；约2008年以后的网络化、职场化和类型市场阶段。

这种六阶段方案是一种解释模型，并非唯一分期。강지전把近现代的集中发展概括为晚清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两次高潮[5]，突出类型聚集，却容易压缩民国、1950年代和改革文学的中介作用；

李云雷则把当代官场小说放在晚清谴责、“十七年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考察[6]，更强调谱系连续。本文吸收二者长处，同时保留阶段间的制度与审美断裂。

资料也有明确边界：民国样本尚不足以穷尽全部政界书写；1958—1976年缺少足够的作品级材料；《老残游记》早期连载回数、《孽海花》早期文字与成熟版本的关系仍有细节待版本专论进一步解决；《新星》的1984年初刊信息目前主要来自次级资料；官方网络文学政策网页未能取得可核正文。以下叙述不以猜测填补这些空白。

二、六阶段历史演变

1. 晚清：报刊网络中的“现形”与揭弊（约1900—1911）

（1）集中生成的语境

鲁迅把庚子以后谴责小说的兴盛与政治失望联系起来，认为人们意识到“政府不足与图治”，遂增强“掊击”之意[2]。这是鲁迅在1920年代所作的文学史解释，而非晚清文学发生的唯一因果。更稳妥的说法是：政治危机、新小说倡议、城市报刊和商业出版彼此叠加，使揭弊写作在1903年前后集中进入公共阅读。

这一阶段的“官场”并非封闭的衙门背景，而是连接卖官鬻爵、候补制度、幕友中介、地方治理和社会风俗的网络。人物多以群像出现：贪官、钻营者、候补官、清官、幕友、商人和旁观者共同展示名教、官箴与实际运行之间的裂缝。串珠式遭遇、游历见闻、夸张讽刺和直露评断，是常见的叙事资源。

（2）个案一：《官场现形记》的群丑结构与出版链

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是后世回溯官场小说谱系时最核心的晚清节点。王学钧依据晚清报刊和初编题署考证，该作自1903年5月起在《世界繁华报》连载；同年10月，前十二回连载完成并结成初编[7]。它用不断更换人物和场景的“现形”结构，将单个贪官扩展为官场群体及其运行规则。其艺术力量来自场景的高密度、对话的世俗性和讽刺的连续累积；局限则在于人物有时服务于揭弊类型，心理纵深让位于制度性丑态的展示。

连载很快转为报馆结集，又遭翻刻并进入版权诉讼。刘颖慧依据晚清报刊“告白”重建了李伯元一方诉至租界会审公堂并胜诉的过程[8]。这一事实说明，晚清官场揭弊不只是一种思想姿态，也已成为报刊—书局机制中的畅销文化商品。作品的传播速度、分编形态乃至版权冲突，都参与塑造了它的篇章节奏和公众影响。

(3) 个案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见闻框架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把官场怪状放进更广阔的转型社会与伦理失序中。其回忆、见闻结构使叙事不断穿越官府、商界、家庭和城市生活，因而不宜只当作狭义官场小说。版本时间尤其需要谨慎：《新小说》第8号封面仍署1903年，但陈大康根据同期广告、日俄战争内容及相邻期号考证，该号实际到1904年才出版[9]。所以准确表述应是“名义刊期1903年、实际出版于1904年”，而不能简单写成1903年已经面世。

(4) 个案三：《老残游记》与“清官之恶”

刘鹗《老残游记》在1903—1904年于《绣像小说》刊出部分，后转其他报刊，1906年初编二十回完整发表；由于早期材料有“十三回”与“十四卷”等记法差异，本文不锁定该阶段的精确回数。它把游历、诊断社会、抒情写景和官场批判结合起来。鲁迅所说“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2]，指出其关键突破：暴政不只来自贪赃者，也可能来自自信正直、以严酷为能事的清官。清官/贪官二元由此受到早期而有力的拆解。

《孽海花》则适合作为边界个案：1903年《江苏》所见早期两回与1905年曾朴改写续作后的二十回本，应视为不同出版事件。作品涉及政治、外交、士人和历史叙事，说明后世常并列的晚清名作并不在题材、结构和美学上完全同质。“四大谴责小说”的经典化归组，不能反过来证明四部作品属于边界整齐的狭义官场类型。

(5) 审美与接受

晚清这一阶段的核心审美动作是让遮蔽之物“现形”：用见闻、夸张、讽刺和连续丑态缩短现实与判断之间的距离。但鲁迅所谓“辞气浮露”“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也是一种带立场的评价[2]，不能转写为可量化的读者事实。可核事实是，报刊连载、快速结集、翻刻和诉讼共同证明作品具有显著的市场流通。江曙专文讨论鲁迅“谴责小说”概念的构建及局限[10]；王学钧则由出版事实误判进一步质疑这一概念的概括力[7]。前者正文目前未能完整取得，后者的版本考证可以采用，但“概念具有虚构性”的强结论仍只是具名学术主张，不能写成学界定论。

2. 民国：官僚社会书写的分流（1912—1949）

晚清集中揭弊的报刊潮流退去之后，官僚经验并未消失，而是分流进入市民小说、政治讽刺和战争动员文学。根据目前材料，与其断言民国存在一个稳定、自觉的“官场小说”类型，不如把这一阶段理解为叙事尺度的转移：品级、卖官和衙门群丑让位于城市机关日常、现代组织程序以及政治行动的表演性。

老舍《离婚》写于1933年，常见书目记同年8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小说以北平小公务员、机关同僚、家庭与市民生活为中心，将敷衍、倾轧和官本位呈现为侵蚀日常人格的生活结构。它的重要性不在于提供一套官场秘闻，而在于用幽默和日常细节揭示机关如何塑造人的疲惫、自欺和妥协。因其叙事中心同时深植婚姻与市民生活，本文称其为“官僚机构日常书写”，不无条件归为狭义官场小说[11]。

张天翼《华威先生》于1938年4月16日发表于《文艺阵地》创刊号。主人公忙于开会、讲话、巡视和争夺领导权，组织名义繁多，实际效能却贫乏。短篇以漫画式夸张揭示现代政治官僚的表演性。作品发表后围绕“抗战文学能否暴露内部黑暗”及文学真实性发生争论[11]，显示接受环境已与晚清不同：批判不只面对市场和审美判断，还受战争动员与政治团结要求的约束。

民国阶段的证据覆盖弱于其他时期。张恨水的政界书写、沙汀《模范县长》、陈白尘《升官图》等仍可构成扩展谱系，但本报告未逐项核实其首版或初演事实，因此不把它们列入核心年表。这里的“分流”是审慎概括，而不是对民国相关作品数量和类型状态的最终统计。

3. 1949—1978：干部、机关叙事的重构、压缩与间歇

1949年以后，政治制度和文学体制改变，旧式“官场”称谓退居边缘；权力经验转而由干部、公仆伦理、组织生活、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治理来表达。这不是简单的题材中断，而是命名、价值合法性和人物关系的重构。

1956年9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这一题名发表于《人民文学》，后通行题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2]。主人公林震带着理想主义进入组织部，与机关惰性、形式主义和复杂干部关系相遇。刘世吾并非单纯“坏官僚”：董丽敏的研究把作品放在青年、革命与社会主义治理的关系中考察，强调常规行政、群众动员、协调能力、疲惫与责任回避之间的复杂张力[13]。因此，小说既是反官僚主义的现实干预，也是在追问革命激情如何转化为持续治理能力。

李国文《改选》发表于1957年第7期《人民文学》。作品围绕基层改选，追问干部究竟应当做“公仆”还是“老爷”，把权力合法性放进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中检验[14]。两部作品共同表明，1956—1957年的“干预生活”写作形成了机关和干部叙事的显著节点。它们发表后引发关于现实真实性和批评边界的争论，随后受到政治批判；这种接受史反过来压缩了公开反官僚主义写作的空间。

对1958—1976年，本报告只作有限判断：干部书写更深地纳入阶级和路线斗争框架，公开表现机关日常矛盾的空间明显收缩，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建立完整作品链。称这一时期“完全空白”同样不准确。1976—1978年的现实批判与伤痕文学开始重新打开空间，而真正可核、并在文学接受中形成强节点的作品出现在1979年。

4. 改革文学：权力叙事的复兴与前类型化（1979—1980年代）

（1）从强势改革者到复杂科层

改革文学以现代化、效率和干部能力为核心，重新赋予体制内人物正面的行动能量。它并非复活晚清“群丑现形”，而是先以改革者与保守力量的冲突建立新的政治伦理，再逐步深入科层利益、组织关系和改革代价。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得两万七千多张读者推荐票，并列年度首奖[15]。作品以强势改革干部整顿企业为主轴，塑造知识、效率和责任相结合的新时期干部英雄。马炜指出，其“改革文学开端”地位由专家、官方评奖和读者参与共同建构，同时，工人主体性在现代化效率想象中相对被弱化[15]。前者是接受史事实，后者是研究者的评价，二者不应混为一谈。

张洁《沉重的翅膀》初刊于《十月》1981年第4—5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12月出版初版；1984年7月的第四次修订本有六十余处重要改动[16]。小说把改革阻力从工厂推进到部委与工业管理科层，冲突不再只是一个英雄面对少数保守者，而涉及不同群体、制度利益和生活重组。版本的多次修订也说明，文本本身在与不断变化的改革语境互动。

柯云路《新星》的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5月出版；现有次级资料常记其初刊于《当代》1984年增刊第3期，但该初刊信息尚未由权威原刊目录再次核定。作品将改革空间推至县域治理、干部关系、农村政策和反腐问题，是改革文学通向政治、官场叙事的重要中介。

（2）叙事与审美变化

晚清作品中的主人公常是见证者、游历者或接续出现的丑类；改革文学则创造具有明确目标和执行能力的体制内行动者。叙事由“揭露一个不能治理的官场”转向“谁有能力推动治理”。但随着空间从工厂扩展到部委和县域，英雄/保守者二元逐渐不足，组织利益、干部网络与行动代价变得突出。这个变化为1990年代的反腐行动叙事和世纪之交的官场生态书写准备了人物、空间和冲突结构。

5. 反腐热潮与官场生态转向（19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

（1）案件化的公共正义

文学评论通常把1990年代社会转型、利益重组与腐败成为公共议题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推动反腐小说形成热潮[17]。此类作品以案件悬念、调查阻力、腐败网络和正义裁决增强可读性；人物常由反腐英雄、腐败干部、利益集团、司法调查者和确认正义的更高权力构成。

陆天明《苍天在上》是常被列举的代表。目前所见馆藏目录显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本，但目录未展示版权页“第1版”，故本文只称其为“目前所见最早单行本”[18]。张平《抉择》于1997年在《啄木鸟》第2—4期连载，群众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第1版，后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作品把腐败网络与领导干部的政治伦理选择结合，使“抉择”既是情节关口，也是公共责任的价值检验。

反腐行动结构具有鲜明历史效力：它把抽象制度问题转化为可追踪的冲突，把公共正义变成读者可以期待的情节结果。但批评者也指出其限度。刘复生认为，一些作品的结局依赖更高权力确认，并容易把腐败处理为个体道德或病理问题，从而弱化制度根源[4]；房福贤以“清官故事”概括相关结构[17]。这些是具名的分析模型，不是对所有反腐小说的统一判决。

（2）从案件胜负到官场生活世界

世纪之交的显著变化，不是反腐主题突然消失，而是叙事重心逐渐从单案、调查和正邪胜负转向组织日常、职位资源、关系规则、人格适应和精神异化。官场不再只是等待清除的病灶，而成为持续塑造人物的生活世界。

王跃文《国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9年5月出版，ISBN为7-02-002952-3；个别评论写作1998年，但出版社书目、国际馆藏与作者自述相互支持1999年5月这一版本事实[1][20]。小说通过官场日常、关系网络和微妙伦理呈现权力环境对人格的塑造。评论史常把它视为官场生态转向的重要作品，作者本人则倾向“政治文化小说”这一称呼[1]。两种分类分别代表外部文学史定位与作者的自我理解，应当并列。

阎真《沧浪之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1年10月出版第1版，ISBN为7-02-003525-6[21]。它以知识分子、干部在组织中的适应、升迁和价值转变为中心，呈现个人如何在原则、家庭责任、职业资源和体制规则之间不断自我辩护。案件不再构成唯一骨架，人物也不容易被清官/贪官二分概括。灰色伦理和心理过程由此成为类型中心。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项目成果介绍，曾把当代官场小说中的价值形态概括为人民伦理、实用主义伦理和精英伦理[22]。这一分类是研究概括而不是作品的天然标签，但它有助于说明：同一“官场小说”名称之下，可以并存主旋律反腐、潜规则适应、精英治理和制度反思。现实主义揭示、官本位批判与权谋合理化，也因此成为相互竞争的接受方式。

6. 网络化、职场化与类型市场（约2008年以后）

网络媒介改变的不只是传播速度。持续连载、超长篇幅、读者反馈和纸网转换，使官场叙事更容易按照职位变化安排阶段，每一次调动、提拔或危机都能开启新单元。公共权力问题由此与职场成长文的升级结构、知识展示和危机管理发生融合。

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笔记》原网络名为《官路风流》，2008年起在起点中文网连载，2010年转为实体出版；截至2014年共出版九册并收束[23]。主人公由基层走向更高层级，每次职位变化重组人物和矛盾。石岸认为它具有“现实主义欲求”，并带有“知识小说”或“模拟教学”效果，同时批评碎片化的官场知识未必能形成统一价值结构[23]。这里的“知识”首先是叙事和阅读体验，不能被当作可靠行政教材。

2010年前后的《文艺报》观察显示，官场与职场曾被并列为类型文学和畅销出版类别，网络传播后再由出版机构转为纸书、分册和续集，是重要生产路径[24]。同期文章给出的首印、累计销量数据针对相关畅销类型或个别畅销作品，不能无差别套用于全部官场小说。

接受分歧随市场扩张而加剧。一方面，网络长篇以细密流程、地方层级和组织关系满足读者理解现实的愿望；另一方面，刘起林批评部分作品沉迷职位、财富、情欲和黑幕，滑向“官场宝典”，题材雷同且缺少人格关怀[25]。这两种评价并非简单真假之争，而是在争论小说究竟应提供制度反思、社会知识、道德警示还是成功技巧。未经核实的“2010年禁止出版官场小说”说法没有可靠公开法规支撑，本报告不将其写入政策史。

三、代表作与历史节点一览

时间	作家、作品或事件	可核事实	发展史意义
1900年后	鲁迅后来概括谴责小说尤盛	属1920年代文学史判断	为晚清集中揭弊建立经典解释框架
1903年5月	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开始连载	《世界繁华报》连载	官场群像与报刊生产结合
1903年10月	《官场现形记》初编	前十二回结集	连载迅速转为商品出版并涉及版权纠纷
1903年名义、1904年实际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始载《新小说》第8号	封面刊期与实际出版不同	提醒文学史区分名义刊期与读者实际接触时间
1903—1906年	刘鹗《老残游记》分阶段发表	1906年初编二十回完整发表	“清官之恶”与游历、抒情扩展揭弊美学
1933年	老舍《离婚》	写作、出版年份可用，精确版本仍待国家馆藏复核	官僚机构进入城市日常和小公务员人格书写
1938年4月16日	张天翼《华威先生》	发表于《文艺阵地》创刊号	组织权力表演及抗战语境中的“暴露”论争
1956年9月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发表于《人民文学》，后	干预生活、机关惰性与社

时间	作家、作品或事件	可核事实	发展史意义
	人》	通行改题	会主义治理探索
1957 年 7 月	李国文《改选》	发表于《人民文学》第 7 期	公仆伦理与基层群众关系
1979 年 7 月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发表于《人民文学》第 7 期并获奖	改革干部英雄与新时期经典化节点
1981 年	张洁《沉重的翅膀》	《十月》第 4—5 期初刊，12 月出初版	权力叙事由工厂推进至部委科层
1985 年 5 月	柯云路《新星》单行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 1 版	县域治理连接改革、政治与官场叙事
1995 年 9 月	陆天明《苍天在上》	目前所见最早单行本	1990 年代反腐热潮代表节点
1997 年	张平《抉择》	《啄木鸟》连载，同年 8 月出第 1 版	反腐行动与领导干部伦理抉择结合
1999 年 5 月	王跃文《国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官场日常与政治文化叙事转向
2001 年 10 月	阎真《沧浪之水》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1 版	组织适应、升迁与精神异化成为中心
2008 年	《官路风流》开始网络连载	起点中文网连载	职位变化组织超长升级叙事
2010 年	《侯卫东官场笔记》纸书化	网络作品转为实体分册	网络—出版合作与类型化成熟

表格说明：表中只列承担本文核心论证、且时间事实达到当前核验门槛的节点；《老残游记》早期回数、《新星》初刊期号及《苍天在上》是否为“首版”等仍按正文所述保留限定。

四、叙事与审美的历史变化

1. 从“群丑现形”到“组织塑形”

晚清叙事常把官场人物接续陈列，以夸张、对话和见闻使制度性丑态显形；人物的代表性往往大于内心纵深。民国作品缩小尺度，以机关同僚、家庭压力、会议和组织表演呈现权力如何渗入日常。1950 年代的机关小说进一步把青年理想、干部经验与常规治理放在同一人物关系中，冲突不再只是“揭出坏人”，而是理想如何遭遇组织惯性。

改革文学重建能动的干部英雄，权力既可能压迫，也成为推进现代化的行动资源。反腐小说则以案件、调查和悬念重新强化情节的性。到《国画》《沧浪之水》，组织不只是冲突发生的背景，而是塑造语言、欲望、自我解释和人格选择的环境。网络阶段再把“被组织塑形”转换为可连续阅读的职业成长过程：人物通过掌握规则、积累关系和应对危机改变位置。

2. “好官”想象的反复与反思

中国权力叙事中，好官、清官和能吏想象反复出现，却从来不是稳定答案。《老残游记》已经指出清官可能凭道德自信制造更大伤害；1950年代作品以公仆伦理衡量干部；改革文学肯定有效率、有担当的行动者；1990年代反腐小说又常借清官或更高权力恢复正义。刘复生等批评者之所以关注“更高权力解决”结构，正因为它可能一面满足公共正义期待，一面把制度问题重新个人化。

世纪之交的生态小说把问题改写为：一个自认正直的人如何逐步适应组织？网络文本则更容易把“成为有效官员”技术化为知识、关系和策略。好官想象没有消失，而是从道德人格、群众关系、改革能力、反腐勇气到职业技术不断改换标准。

3. 人物复杂性并非单线进步

不能简单说官场小说“越到后来人物越复杂”。晚清《老残游记》的清官悖论已突破善恶二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刘世吾兼有治理经验、疲惫和责任退缩；改革英雄的明确价值方向也并不等于艺术上简单，而是服务于特定历史行动想象。世纪之交的突出变化，是灰度人物、心理辩护和日常妥协由个别现象变成类型中心；网络阶段的人物又可能因超长连载而既获得丰富经历，也被“升级”功能格式化。

4. 现实主义的不同含义

各时期都把“写出现实”当作重要合法性来源，但“现实”并不相同：晚清强调揭开伏藏；民国关注机关与都市日常；1950年代把现实理解为治理矛盾与批评边界；改革文学强调现代化实践；反腐小说突出案件纪实感和公共危机；官场生态小说深入规则与心理；网络作品则以流程、层级和知识密度制造“在场感”。因此，现实主义不是一条不变的尺度，而是每个时期对何种经验可见、何种判断可说的重新协商。

五、出版传播与社会接受

1. 报刊、书局与版权：晚清的类型基础设施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都与新式期刊、报纸连载紧密相连。连载制造持续期待，分编结集便于迅速变现，翻刻则暴露市场和版权秩序的矛盾。《官场现形记》版权诉讼尤其说明，“批判现实”与“文化商品”并非彼此排斥；传播机制直接进入作品的历史生命。

2. 文学期刊、评奖与经典化：1949 年后的制度传播

《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期刊不只是发表平台，也是现实题材获得公共意义的制度节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争论和遭遇显示，批评边界可以决定作品的流通命运；《乔厂长上任记》的读者推荐和全国性评奖则表明，专家、官方制度与大众选择共同建构“改革文学开端”。《沉重的翅膀》的修订史进一步显示，传播中的文本并非永远固定。

3. 畅销出版与市场标签：1990 年代以后

反腐小说的案件性和公共议题使其具有较强大众可读性；世纪之交，“官场小说”作为市场标签进一步突出。标签提高识别度，却也可能把政治文化、人格异化、制度反思等不同作品压缩为“秘闻”或“权术”。作家对标签的抵抗与评论界的再分类，正是市场命名产生反作用的证据。

4. 网络连载、纸网联动与参与式接受

网络文学把出版前的写作过程转为公开、持续的连载，文本长度、危机密度和人物升级都更依赖持续反馈。纸书化又把网络声量转换为分册出版和类型品牌。读者既可能把作品当现实知识入口，也可能按职业成功学阅读。平台机制、出版营销与读者用途共同改变了“代表作”如何产生；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对具体算法、政策禁令或全部销量作可靠断言。

六、主要争议

1. “谴责小说”是有效概念还是后设误判？

鲁迅的概念长期提供了理解晚清揭弊小说的基本框架[2]，但它本身也是 1920 年代的文学史建构。江曙的论文题名即指出对其“构建及其局限”的讨论[10]；由于本文未取得全文，不进一步代拟其论证。王学钧以《官场现形记》出版时间等事实为依据，提出“谴责小说”概念具有“虚构性”的强质疑[7]。本文的处理是：采用其可独立核验的版本考证，但不从鲁迅若干事实误判直接推导整个概念无效。概念有后设性，不等于没有解释力；关键在于不把它说成晚清作者的共同自称，也不假定归组作品完全同质。

2. 官场小说与反腐小说能否严格区分？

两者的分类轴不同。反腐小说突出主题和行动，官场小说突出场域、机制和生活世界。具体作品可能同时属于两者，也可能只在一个谱系中居中心。将二者简单等同，会遗漏《国画》《沧浪之水》式非案件中心写作；把官场小说机械设为反腐小说的上位概念，又会遗漏发生在其他组织空间的反腐叙事。

3. 民国是衰退、断裂还是分流？

现有材料能证明官僚经验在《离婚》《华威先生》等作品中继续存在，却不足以证明形成了与晚清或当代相当的统一类型潮流。因此，“分流”是目前最稳妥的描述：它承认传统没有绝迹，也承认名称、文类和传播机制已经改变。这一判断仍受样本数量限制。

4. 反腐小说是在批判权力，还是修复权力合法性？

反腐小说可以激活公共正义、揭示利益网络，也可能依赖清官、英雄或更高权力完成结局。刘复生和房福贤等人的批评把后一结构视为制度反思的限度[4][17]。但不能因此把全部反腐小说归结为合法性修复；作品中的调查过程、群众处境和人物伦理仍可能保留批判张力。更准确的做法是逐作分析“问题被定位在个人、网络还是制度”，以及解决方案由何种力量承担。

5. 官场生态书写是深化现实主义，还是合理化潜规则？

对灰色伦理、关系网络和组织规则的细写，可以揭示权力如何塑造日常；同样的细节也可能被读为可模仿的技巧。当作品减少明确道德裁决，现实主义观察与犬儒主义接受之间的距离会缩短。国家社科项目所概括的多种价值伦理[22]，提示这一类型内部不存在单一价值方向。

6. 网络官场小说是“知识小说”还是“官场宝典”？

石岸的“现实主义欲求”和“知识小说”评价[23]，与刘起林对“官场宝典”、审美缺失的批评[25]，代表两种相反但都可理解的阅读期待。本文认为，关键不在于作品是否包含大量组织知识，而在于这些知识是否被置于公共责任、制度后果和人格代价的反思之中。若只把规则变成升级工具，公共权力会被技术化；若能展示规则、行动和受影响者之间的关系，类型叙事仍可保持现实主义深度。

七、结论：在体裁史与权力文化史之间

中国官场小说的发展不能缩写为一部历代腐败史，也不能只列畅销作品。它是一条围绕公共权力经验不断改变名称、人物、情节和媒介的叙事谱系。其连续性主要有五点：持续揭示正式规则与实际

运作的落差；反复追问权力如何塑造人格；不断重写好官与清官想象；始终借“现实”建立文学正当性；传播机制持续参与作品形态。

断裂同样明显。晚清以政治失望、现形与讽刺为核心，民国将官僚经验拆入日常和政治讽刺，1950年代以公仆伦理和治理问题重新命名，改革文学塑造能动干部，反腐小说借案件恢复公共正义，世纪之交把灰色日常和精神异化推到中心，网络文学又用升级、知识和持续连载改写阅读。行动主体由旁观、揭露者转为治理者、调查者、适应者和成长型职业主体；生产机制也由报刊—书局—翻刻，转向国家文学期刊与评奖，再到商业出版、网络平台和纸网联动。

因此，评价这一谱系不宜诉诸“越来越真实”或“越来越堕落”的单线判断。晚清“现形”的批判锋芒、改革文学的行动乐观、反腐小说的公共正义、官场生态小说的心理深描和网络文本的组织知识，各有历史效力，也各有遮蔽。名称的变化本身，就是社会不断重新回答“何种权力经验值得成为小说、小说应当如何干预现实”的证据。边界开放并不使概念失效；只要公开纳入标准、区分事实与评价，并对资料缺口保持诚实，“官场小说”仍可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权力文化关系的有效入口。

参考文献

网页均检索于2026年8月11日。馆藏与数据库条目主要承担版本事实核验；专业评论中的价值判断均在正文具名呈现。

[1] 王跃文：《大事小说——小说创作谈》，中国作家网，2026-01-30。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6/0130/c404032-40656211.html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维基文库在线本。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s/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3] 夏晓虹：《晚清“新小说”辨义》，原载《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https://www.cssn.cn/wx/wx_zggdwx/202208/t20220802_5442851.shtml

[4] 刘复生：《“反腐败”小说为什么这么火？》，《文艺批评》，中国作家网转载，2017-04-12。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412/c404033-29205425.html

[5] 강지전：《中国的“官场”与“官场小说”》，《中国语文论丛》2015年第67期，第341—362页，DOI: 10.26586/chls.2015..67.013。https://www.kci.go.kr/kciportal/landing/article.kci?arti_id=ART001962777

[6] 李云雷：《历史视野中的“官场小说”》（网页题名解析存在“从历史视野看‘官场小说’”异文），中国作家网，2012-12-26。https://www.chinawriter.com.cn/2012/2012-12-26/150468.html

[7] 王学钧：《事实判断失误：论谴责小说概念的虚构性》，《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4卷第2期，第6—12页。

[8] 刘颖慧：《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版权诉讼始末》，《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8卷第3期，第39—43页。https://xbzs.ecnu.edu.cn/CN/abstract/abstract8501.shtml

[9] 陈大康：《〈新小说〉出版时间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1卷第2期，第81—85页，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09.02.013。https://xbzs.ecnu.edu.cn/CN/html/20090213.htm

[10] 江曙：《鲁迅“谴责小说”概念的构建及其局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8卷第9期，第76—83页。https://jnxj.jnu.edu.cn/skb/CN/Y2016/V38/I9/76

[11] 民国官僚书写资料组：东北大学学报《一面病态人格的镜子——浅析老舍小说对官本位思想的批判》，https://xuebao.neu.edu.cn/social/CN/abstract/abstract809.shtml；南京大学《“幽默”的变迁：论文学场对老舍的塑造——以〈离婚〉的三个版本为例》，https://njucml.nju.edu.cn/5f/57/c22611a352087/page.htm；倪文尖：《〈华威先生〉：当代视界及其他》，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https://wxs.sass.org.cn/2023/0607/c6913a545714/page.htm

[12] 孟繁华：《王蒙和他的青春写作——王蒙与青春有关的两部小说》，《文艺报》/中国作家网，2023-11-27。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1127/c404030-40126342.html

[13] 董丽敏：《青年、革命与社会主义治理探索——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师范大学转载，2021-11-24。https://xw.shnu.edu.cn/81/29/c23266a753961/page.htm

[14] 北京大学：《文学新秀的摆渡人、京城四大名编崔道怡》（含《改选》发表史料）。https://news.pku.edu.cn/bdrw/137-111905.htm

[15] 马炜：《文学论争与新时期的文化政治——以〈乔厂长上任记〉的经典建构为例》，原载《当代作家评论》，中国作家网转载，2024-06-26。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4/0626/c419384-40264278.html

[16] 岳雯：《改革的可能性与文学——重读〈沉重的翅膀〉（下）》，中国作家网，2014-03-17。https://www.chinawriter.com.cn/2014/2014-03-17/196235.html

[17] 1990 年代反腐与官场生态转型资料组：中国作家网《官场小说：时代症候现形》，2015-04-20，<https://www.chinawriter.com.cn/2015/2015-04-20/240021.html>；房福贤：《反腐小说为何总是讲述“清官”的故事？》，《博览群书》2014-10-01，https://epaper.gmw.cn/blqs/html/2014-10/01/nw.D110000blqs_20141001_6-01.htm?div=-1

[18] 陆天明：《苍天在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年 9 月，ISBN 7-5321-1412-0；深圳图书馆馆藏目录。<https://ilas.szclib.org.cn/ILASOPAC/NTRdrBookRetr.do?LeftLanguageKey=CNMARC&LeftLanguageType=language&PageNum=10&ResearchSearchType=null&SearchKey=I247.5&SearchType=classno&leftAuthorKey=%E9%99%86%E5%A4%A9%E6%98%8E%E8%91%97&leftAuthorType=author&researchSearchKey=null&searchWay=searchWayPr>
v

[19] 张平：《抉择》，《啄木鸟》1997 年第 2—4 期连载；群众出版社，1997 年 8 月第 1 版，ISBN 7-5014-1603-6；CiNii 馆藏记录。<https://ci.nii.ac.jp/ncid/BA68232034>

[20] 王跃文：《国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 5 月，ISBN 7-02-002952-3；CiNii 馆藏记录。<https://ci.nii.ac.jp/ncid/BA56869566>

[21] 阎真：《沧浪之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 1 版，ISBN 7-02-003525-6；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检索记录。<https://ndlsearch.ndl.go.jp/books/R100000001-I18111104331739>

[22]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成果介绍》，2012-06-08；相关成果原载《文艺研究》2012 年第 4 期。<https://www.nopss.gov.cn/GB/223330/18122276.html>

[23] 石岸：《小桥老树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欲求》，中国作家网，2014-08-18。<https://www.chinawriter.com.cn/bk/2014-08-18/77462.html>

[24] 胡军、饶翔：《类型化创作引起评论界关注》，《文艺报》2010-02-24。<https://wyb.chinawriter.com.cn/Pad/content/201002/24/content26694.html>

[25] 刘起林：《“官场小说”的审美缺失》，《文艺报》2010-02-22 第 6 版。<https://wyb.chinawriter.com.cn/content/201002/22/content26763.html>

资料核验限制说明

1. 江曙论文目前仅核到完整书目信息，未取得可读全文，故正文只据其题名确认存在相关学术讨论，没有转述其具体论证。

2. 《老残游记》在《绣像小说》阶段究竟计十三回还是十四卷，现有材料存在计量和版本表述差异；本文只写“刊出部分”。
3. 《孽海花》区分1903年《江苏》早期两回和1905年曾朴改写续作后的二十回本，不把二者压成单一“初版”事件。
4. 民国阶段除《离婚》《华威先生》外，扩展样本尚未逐项核首版或初演；本报告的“分流”判断并非穷尽性统计。
5. 1958—1976年缺少足够作品级证据，因此没有虚构连续作品链，也未称其“完全空白”。
6. 《新星》的198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可核；1984年初刊期号目前依次级资料，正文已加限定。
7. 《苍天在上》1995年9月本是目前所见最早单行本，因未核版权页，不断言其为第1版。
8. 网络文学政策、影视改编时间及收视数据未达到本报告的核验门槛，故不作具体政策或数据断言。